

经济增长为何与就业增长不同步

近几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就业未能出现同步增长,各方面对此十分关注。经济增长了,就业就提高了,这是一个普遍规律。衡量经济发展,不仅要看速度,更要看效益;不仅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经济增长应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最终目标,与消费同步,与就业增长、社会公平和资源环境改善同步。宏观经济政策和就业政策的改革,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仍有待于经济增长模式的实质性转变,即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优先”转向以扩大就业、减少失业为核心的“就业增长优先”模式。

◎梁达

就业是民生之本。长期以来,政府和有关部门一直把就业问题放在“民生之本”的优先位置加以考虑,实行了一系列就业再就业政策和举措,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成效显著。但经济增长与就业发展不同步的现象仍然存在,不少人仍觉得就业越来越难,尤其是近几年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现象并存,使就业矛盾更显突出。关注并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快速增长与就业发展不同步的矛盾,成为改善民生与促进稳定的重要问题之一。

随着市场经济转型,经济结构变革,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必然要求经济增长方式从经济增长优先型向就业增长优先型转变,创造就业和工作岗位必然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长期以来,中国保持了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依靠经济扩张带动就业。但是,就业弹性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0.32下降到90年代的平均0.1左右,即使保持现在的高经济增长速度,每年新增就业岗位也只有800万个左右。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一方面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另一方面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也长期存在,就业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又相互交织,就业问题一直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大问题。当务之急是,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最大限度降低经济增长的代价,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实现经济增长向“又好又快”的转变,不断迈向更高的台阶。

经济发展与就业的特点

1、就业规模扩大。近年来,我国就业保持较快增长,就业总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城镇每年新增就业人数都超过900万人,GDP总量从1978年的2466.19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就业人数也由4.01亿人增加到7.7亿人,增加了3.69亿人。2007年末比上年末增加590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29350万人,净增加1040万人,新增1204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比上年末下降0.1个百分点,比2003年年末下降0.3个百分点。

2003—2007年,全国就业总量稳步增长,平均每年新增就业人数超过1000万人,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一产业的人数每年减少1077万人的同时,从事二、三产业的人数分别增加了861万人和881万人。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就业人员持续增加,2007年已经超过1.3亿人,比2003年的9800万人增加35%。

2、就业增长速度慢于GDP增速。九五期间GDP年均增长8.6%,年均增加就业人数804万人;十五期间GDP年均增长9.5%,年均增加就业人数只有748万人,比“九五”时期少56万人。与经济增长速度相比,

就业增长速度相对缓慢。1985年到1990年,GDP年均增长7.9%,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1991年到1995年,GDP年均增长11.6%,同期就业人口年增长率为1.2%;1996年到1999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3%,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可见经济增长与就业呈现不同步增长态势。

3、城镇失业率稳中趋降。2007年城镇新增就业达1204万人,创下2002年实施积极就业政策以来的最高水平。与城镇新增就业连续上升相对应的是失业率持续下降:2003年末和2005年末均为4.2%,2006年末为4.1%,2007年末进一步降至4%。2003年至2007年,城镇就业人员年均新增约1000万人,登记失业率一直控制在4.3%以内。

4、就业弹性系数处于下降状态。从“九五”到“十五”,GDP年均增长率由8.6%提高到9.5%,而就业年均增加人数由804万人下降到748万人,就业弹性系数也由“九五”时期的平均0.14下降到“十五”时期的0.12,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量由94万人减少到80万人。

5、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需求结构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第三产业的需求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的需求比重上升。从行业需求看,需求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和建筑业。其中,制造业和建筑业的用人需求占第二产业全部用人需求的90%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用人需求占第三产业全部用人需求的74%左右。

从以上数据可看出,就业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不匹配,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趋降的现象亟需改变。

众多因素形成经济增长与就业不同步

经济高速增长并未带来高就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归纳为:

一、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了就业总规模的扩大。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转移,经济增长创造的相当一部分就业岗位都是由农村转移劳动力占有的,而这些农村劳动力是带着“已就业”身份实现转移的。

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13181万人。外出从业劳动力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56.7%;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40.5%。这种“农转非”并没有完全纳入城镇就业规模统计。

二、经济结构升级成为影响就业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大幅调整和不断升级的过程中,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较

快,相同资金带来的就业增长自然就比过去减少了。国内很多地方在经济快速增长同时,都在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资金、技术密集型企业替代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因素,但是投资的构成主要是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建设,以及投资回报率高而劳动需求小的行业,如能源、房地产、汽车等,这些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发展,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含量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也不断提高,也会相应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

三、出口企业带动作用减弱。改革开放以来,带动就业增长的主要是出口行业,这些行业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但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这些行业的利润空间缩小,并且在进入加入世贸组织后过渡期后,中国的贸易摩擦加剧,使得就业增速比改革开放前期有所减缓。

四、三次产业对就业的拉动力变化较大。近几年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是第三产业,其中国有企业和大企业是主力,而这些企业吸收劳动力、增加就业岗位的能力有限;中小企业对GDP贡献相对较小,它们却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吸收大量的劳动力,但它们在竞争环境等方面压力很大,发展壮大受到影响,工作岗位的必然增加也受到限制。

从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的作用看,2003年以来,我国城镇就业弹性系数一直稳定在0.31—0.35之间,五年的算术平均值为0.33。也就是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大约可带动就业增加0.33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的平均就业弹性系数,由“九五”时期的0.16变为“十五”时期的-0.16,而二、三产业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仍较明显,就业弹性系数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二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由“九五”时期的0.05,提高到“十五”时期的0.19;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由“九五”时期的0.35,提高到“十五”时期的0.37。表明二、三产业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仍较明显。由此可见,农村就业人员逐年减少,导致第一产业就业弹性系数下降,是总就业弹性系数下降的直接原因。

五、劳动力市场本身的因素也影响到就业增加。随着市场机制基础作用的发挥,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增强,人才素质与市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也影响了就业规模的扩大。我国就业压力不仅体现在总量上,也反映在结构上。一方面找工作难或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有些岗位却没有人去做。就业的地域性和专业性矛盾更为突出,基层和西部人才紧缺,高端和低端人才不足。这种状况也使得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岗位处于“虚位”状态。

六、重经济增长、轻就业影响就业渠道的拓宽。多年来,一些地区在发展战略上没有统筹考虑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普遍存在着重GDP增

长轻就业的倾向。在对待就业问题上存在误区,如认为工业化能够自动促进就业、劳动成本低才有利于促进就业等,这些认识误区直接影响了政府在经济或产业结构布局上的作为,而长期的低劳工成本不仅影响城乡居民的购买力,更直接影响着产业结构与生产发展,进而对就业岗位的增长形成抑制局面。

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不容乐观

尽管各级政府和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就业再就业的方针,在扩大就业、增加就业岗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格局没有改变,劳动者总体素质不能适应就业需要的主要矛盾依然存在。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匹配长期发展下去,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一是容易造成人力资源浪费,进入劳动年龄而未如期就业,无疑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

二是大学生就业难,对社会负面影响大。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同样是一种教育资源的浪费。

三是增加社会矛盾,危及社会和谐稳定。高增长低就业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种格局得以持续,失业率会持续攀升,正规就业岗位将更加紧张,非正规就业或者不充分就业将更加泛滥,劳动者地位将进一步弱化,贫困现象将加剧,社会矛盾会激化。如低端就业领域紧张与高端就业相对宽松形成鲜明对比,结果就会导致好的越好,差的越差,社会分层加剧。同时,大量人员处于非就业状态,这对社会治安也是一大不稳定因素。

从近期和中长期看,我国安排就业的难度将加大,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目标任务仍将十分艰巨。

一、2008年是国有企业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的最后一年,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措施,又会产生新的失业。此外,中西部地区还有一大批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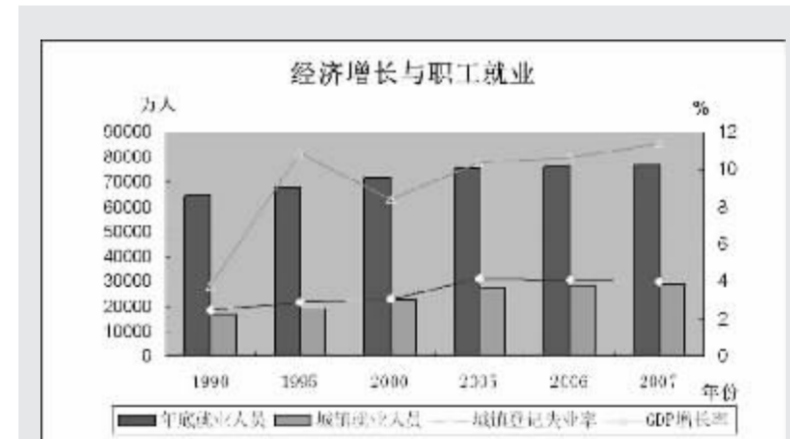
业问题需要解决。因此,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目标任务仍将十分艰巨。

二、调整进出口关系,应付人民币升值等将会影响就业。多年来东南沿海的劳动力需求岗位旺,大量转移我国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增加了城镇就业机会。但近年来出口顺差过大,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出口创汇贬值压力较大,廉价土地、资源、环境等的出口代价也过大,需要通过关税调整,降低和取消出口退税,提高社保、工资、土地、环境等出口成本等办法平衡贸易。因此,出口的减速,也会减少劳动力的使用,使出口贸易强劲的劳动力需求势头减弱。

三、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将从去年的464万人增至532万人。除去10%考研、考博学生、专升本学生以及出国留学学生,再加上去年待就业的70—80万人,2008年实际需要就业的人数在600万人以上。迄今为止,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超过1亿人,转移就业形势严峻。

四、下岗人员数量呈降势,但就业总量压力会持续不减。今后,我国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口将超过2500万人,而新增的就业岗位加上自然减员也只有1000万个,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500万个以上,供需矛盾突出。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资源枯竭的城市就业问题更加突出。高校毕业生、职业高中、当年未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复转军人、农转非人员等人数将有增无减;在农村,现有劳动力近5亿人,除去已经转移就业的2亿多人,以及农村需要务农的1.8亿人,尚有近1亿左右的富余劳动力。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向城镇转移的规模将不断增加,对我国今后几年的就业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综上所述,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格局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依然是就业工作的重点,每年仍有1000多万个就业缺口。在此基础上,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现象却日益明显。



年份	经济活动人口 (万人)	第一产业 (万人)	第二产业 (万人)	第三产业 (万人)	构成 (合计=100)			
					第一产业 (%)	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 (%)	
1978	40682	40152	28318	6945	4890	70.5	17.3	12.2
1980	42903	42361	29122	7707	5532	68.7	18.2	13.1
1985	50112	48973	31130	10394	8359	62.4	20.8	16.8
1990	65323	64749	38914	13856	11979	60.1	21.4	18.5
1991	66091	65491	39098	14015	12378	59.7	21.4	18.9
1992	66782	66152	38699	14355	13098	58.5	21.7	19.8
1993	67468	66808	37680	14985	14163	56.4	22.4	21.2
1994	68135	67455	36626	15312	15515	54.3	22.7	23
1995	68855	68065	35530	15655	16880	52.2	23	24.8
1996	69765	68950	34820	16203	17927	50.5	23.5	26
1997	70800	69820	34840	16547	18432	49.9	23.7	26.4
1998	72087	70837	35177	16600	18860	49.8	23.5	26.7
1999	72791	71394	35768	16421	19205	50.1	23	26.9
2000	73992	72085	36043	16219	19823	50	22.5	27.5
2001	74432	73025	36513	16284	20228	50	22.3	27.7
2002	75360	73740	36870	15790	21090	50	21.4	28.6
2003	76075	74432	36546	16071	21809	49.1	21.6	29.3
2004	76853	75200	35269	16920	23011	46.9	22.5	30.6
2005	77877	75825	33970	18084	23771	44.8	23.8	31.4
2006	78244	76400	32561	19225	24614	42.6	25.2	32.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努力使经济高速增长转化为高就业

就业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改革发展的稳定大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应该看到,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宏观经济政策和就业政策的改革,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仍有待于经济增长模式的实质性转变,即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优先”转向以扩大就业、减少失业为核心的“就业增长优先”模式,正确处理协调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之间、劳工利益与资本利益之间、扩大内需与创造就业之间的关系。

一、处理好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关系。要适度地抑制GDP的过高增长速度,使各级政府有更多的精

力来促进就业,重视一些虽然不能支撑GDP快速增长但能够容纳更多就业者的产业。只有适度抑制过快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才可能让城乡居民通过劳动就业等途径获得更多的收益,进而促进消费、促进生产、增加就业。以适度降低增长率来换取就业稳步增长,并在增长速度调整中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良性化与健康化。要继续在注重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同时,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把增加就业岗位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要坚持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并举,坚持把经济增长点作为就业工作的着力点,积极协调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二、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再就业政

策,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把体制转轨时期遗留下来的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以及部分地区、行业就业困难群体安置和高校毕业生等就业问题作为重点,多渠道、多形式拓宽就业渠道,想方设法增加就业岗位。

三、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要更加注重发展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进一步扩大就业。一方面,注重用高技术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改造为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注重从政策上适时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以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

四、积极支持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近几年来,中小企业和非公

制企业发展很快,为缓解就业矛盾、扩大就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今后要更进一步消除在市场准入、资金融通等方面对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歧视,为提供真正意义上公平竞争的环境,使他们逐步享受真正的国民待遇。

五、大力发展服务业,认真落实促进服务业扩大就业的各项政策。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的服务业,取消对非国有经济在经营范围、从业条件、资金融通、税费征收等方面的不合理限制。支持、鼓励和引导私营、个体企业兴办服务业,充分发挥在活跃市场、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把发展小城镇服务业作为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重要载体,把加快发展服务业与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健全小城镇居住服务、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

功能。

六、加大就业技能培训,增强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要注重发展职业教育,加强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工作,发展就业中介组织,帮助适龄劳动者增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扩大就业的选择余地。

总之,随着国家相关促进就业政策的落实和进一步发挥作用,我国就业形势将会逐步改善。从长期看,随着经济结构的逐步合理和改革的深度推进,经济增长必将带来一个更大规模的就业增加。当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就业压力仍将始终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也应当看到这个问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必须坚持不懈地把解决就业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使人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

(梁达)

今日看板——中国股市十问

股市暴涨暴跌与投融资关系错位有关

◎亚夫

投资与融资,虽是一字之差,但对股市运行的影响却有很大不同。是投资第一,还是融资第一?这个看似很基本的问题,其实与本行情被过度操弄,从而大起大落有直接关系。何以见得?先来看融资第一,是个什么结果。

沪深股市从开设之初直到现在,为上市公司融资一直被作为理所当然的事,除了个别公司实在不象话,很少有人质疑公司的融资行为。从最初的“老八股”实验性融资,到后来为部分缺钱国企脱债解困,直到去年一系列特大型国企上市,企业到公共市场上廉价融资不仅很少受到质疑,而且时常被过度礼遇。

比如,我们由近及远地看,这两年,包括银行、保险、房地产,以及能源、机械、工程等,有多少超级大蓝筹到股市中募集了让全世界都感到震惊的巨额资金,又有多少大蓝筹以惊人的市盈率急速上市?在沪深股市之前就已介入的大机构或利益集团外,又有多少社会公众投资人不是被作为出货对象介入股市的?大蓝筹的融资行为,特别是以高市盈率上市的行为合适吗?

再来看股改问题,之所以有这个问题,正是由于一些上市公司的不规范融资造成的。在沪深股市开市之初,以及为部分国企融资解困的时段,上市公司在股权结构上的种种畸形设计,虽有体制机制等历史原因,但也是为了低成本融资、解决企业的资金困难,很少对社会公众投资人的合理回报安排。

股市把公司融资放在第一位,其不良后果有四:一是股东利益结构失衡,股东诉求不一致。大股东以及与大股东利益攸关的大机构,与社会公众投资人的利益诉求不一致,甚至把公众股东当作猎物,这是市场诸多问题的根源。

二是社会财富分配畸形,股市成了投机家的乐园。从公司年报等记录看,通过上市实现财富暴增,是个别大股东实现暴富的最佳途径。而在少数人暴富的同时,则是大多数社会公众投资人的资产,被转移到少数人掌控的公司乃至少数人手中。

三是股市功能扭曲,非理性震荡加剧。由于社会公众投资人在二级市场市场博傻,因此要么在高位被忽悠入市,要么在低位被挤压割肉。股市的投资功能扭曲,市场的非理性震荡加剧,自然也就成为难以逃脱的宿命。

四是市场效率降低,社会成本巨大。由于市场时常处于非理性状态,而成千上万个投资者的投资得不到合理回报,因此造成的投资伤害包括心理伤害很大。而这一切不是没有成本的,这就是社会成本。从资金成本,到心理成本,直至舆论成本,都是高昂的。

显然,把企业融资放在股市的第一位是不合适的。尽管股市有融资功能,但股市主要是公共投资场所。它的第一性是公共性、公共性。正是由于它具有社会性与公共性,才使上市公司能够享受低廉、充沛的社会资源。

而正是由于作为公众公司的上市公司对公共资源的特殊享用,也需要它给予社会投资人以合理回报。尤其当上市公司作为超出社会平均利润的创造者时,它对公众投资者的回报,应该远远超出社会平均回报率。

然而,现实又怎样呢?有几家公司对公众投资者的红利回报,尤其是实实在在的现金红利回报,是可预期、可持续与合适的呢?而公众投资人得不到正常回报,又怎能不在二级市场上做消耗性的短线投机呢?而这种所谓的波段操作引发的股市大起大落,正与投融资关系的颠倒错位有很大关系。

由此来看,摆正股市的投融资关系,将社会公众投资人的特性放在第一位,是正本清源、减少股市非理性波动的重要课题之一。而要将投资放在第一位,将股市的本性回归到自然状态,需摆正以下几大关系。

一是公司融资行为与对投资者合理回报的关系。公司融资首先要对投资者,尤其是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放在第一位加以考虑。不能给投资者合理、可预期、可持续的回报,就没有必要融资。

二是公司融资行为与市场稳定运行的关系。如果公司融资导致市场供求过度失衡,影响市场正常运行,损害大多数投资者利益,就应该考虑选择其它方式或时点进行作业。

三是公司融资行为与市场评价体系的构建关系。长期以来,由于投、融资关系错位,使这个市场找不到正常的评价方式与标准。如果能够对包括社会股东在内的所有股东的投资回报率来衡量,比如除市盈率之外,引入红利率标准,也许能吸引以股息回报为目标的长线投资者。

中国股市发展到今天,该解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了。惟有摆正其公共投资的位置,才有可能避免非理性的暴涨暴跌。